

阙里孔庙御制楹联匾额考论^{*①}

王振星

(济宁学院 学报编辑部 山东 曲阜 273155)

摘要: 清代皇帝为阙里孔庙题写颁赐了不少楹联匾额,其中乾隆皇帝的御制最多。这在正史中多有提及,在山东方志中也得到了具体的展现。通过考证部分匾联颁赐的时间、悬挂的地点,觅出与北京孔庙的差异;同时考察匾联的内涵,显示书写匾联颁赐全国文庙不仅成了皇帝的特权,也成了皇权的外在显现,体现了清室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这些匾联是阙里孔庙的艺术点缀,体现了我们民族诗性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 阙里孔庙; 御制; 楹联匾额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9)01-0114-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1.012

“阙里”是孔子成长的地方。东汉以来,孔子故里被称为“阙里”,此后“阙里”逐渐成为曲阜的代称。《阙里志》卷十一《古迹志》记载“阙里,汉晋春秋曰阙里者,夫子之故宅也。在鲁城中,又云鲁县,有二石阙曰阙里,盖里门也。……自先圣作《春秋》成,号称素王阙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乡里而曰阙里,盖谓圣人讲道之庭,诸弟子尊称也。”^②阙里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特殊载体,历代先后有12位皇帝亲诣此地祭祀孔子,计20次之多。其中尤以清代为最,康熙1次,乾隆9次,并留下了阙里孔庙现存的匾额与楹联。对其进行考证与研究,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追忆与反思,而且是一种当下的传承与发展。

孔庙的匾额与楹联都与祭孔息息相关。特别是清王朝,统治者尊崇儒学,隆盛孔子,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来阙里孔庙祭孔,“行三跪九叩头礼”,并真诚地说“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随命侍卫捧出卷轴,展开御书‘万世师表’四字。衍圣公孔毓圻跪接,捧安神座前。”^③不仅如此,“康熙甲子孟冬敬书”的“万世师表”刻石,也于同年(1864年)十一月立碑存于孔庙圣迹殿内。较之《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内容基本相符:“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至大成殿,乐作,上行三跪九叩礼……上复至大成殿前,命大学士等宣谕曰:……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④“万世师表”

* 收稿日期: 2018-10-21

作者简介: 王振星(1964—),男,山东济宁人,《济宁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儒家先贤庙宇府第楹联文化研究”(15CWHJ24)的阶段性成果。

②陈镐纂修《阙里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526页(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下同)。

③岳澹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56-558页(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下同)。

④《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七,中华书局影印本(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下同)。

不是来源于儒家经典,见于《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脩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①康熙轰轰烈烈的祭孔举措,更大限度地抬升了孔子的尊荣与地位。由此,在汉文化语境中,“万世师表”就成为后世指称孔子至尊至大的专用语了。

雍正二年(1724年),曲阜孔庙发生火灾,雍正帝下旨重建。第二年八月,阙里孔庙兴工。《山东通志》卷十一载,雍正四年(1726年),“御题‘生民未有’匾额于圣庙大成殿,颁发直隶各省府州县衙儒学恭摹制造”^②。《曲阜县志》卷三十三说“颁御书‘生民未有’额于大成殿。”^③雍正七年(1729年),孔庙重建竣工,雍正帝要求“盖阙里大成殿改用黄瓦。庙自明弘治十三年始用绿色琉璃瓦,今特改黄瓦,由内厂监造,运赴曲阜。”^④“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祀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⑤雍正虽然没有亲临阙里孔庙,但对阙里孔庙格外重视,并不止一次为之书写匾联,“颁御书大成殿匾额,御书御制对联悬之庙堂。”^⑥雍正八年(1730年),山东通政使留保“奏称圣庙悬挂匾额,请将圣祖仁皇帝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恭安于殿内天花枋上;皇帝御书‘生民未有’匾额安于殿外门枋之上,御书对联安于殿外正间明柱”^⑦。直到雍正九年(1731年)八月,雍正皇帝“颁赐御书大成殿匾额、御制对联,悬于圣庙。题大成殿联曰:德冠民生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题大成门联曰: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⑧。而且“生民未有”匾额和“德冠民生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刻石,都藏于孔庙奎文阁内。《曲阜县志》与《山东通志》记载雍正颁赐御书匾联的时间与《清实录》所载不一致,《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十五云:“雍正三年八月庚午,颁发孔子及颜曾思孟闵子仲子庙御书匾额。孔子庙,曰‘生民未有’。……大学士等奏请御书‘生民未有’四字,敕下礼部钩摹。颁发直省,悬榜孔子庙,昭垂永久。”^⑨《日下旧闻考》也有类似的记述:“雍正三年世宗御书额曰生民未有。”^⑩雍正三年(1725年),为孔庙颁发御书匾额“生民未有”,并下令各省文庙一并悬挂。可见,方志记载的时间未必都准确。根据《清实录》看,雍正皇帝御书匾额时间较早,在雍正三年,后来又御书颁赐了楹联。

雍正皇帝不仅重修阙里孔庙,更重要的是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体认。他书写的前一联为木刻行书,悬挂于大成殿正门两侧。仁义之道是儒家崇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修身养性,培养君子人格,是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的基石。孔子注重“德治”,强调国家政治必须首先从修德开始,其“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熔铸着人们的灵魂。后一联则展现了孔子的人伦高标,文教功绩润泽后世,“先知先觉”“至诚至圣”重在概括孔子的超凡,“伦常立

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7页。

②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75页。

③潘相纂修《曲阜县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引文标点为作者所加,下同)。

④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77页。

⑤潘相纂修《曲阜县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⑥潘相纂修《曲阜县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⑦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80页。

⑧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85页。

⑨《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十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⑩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97页。

极”“功化同流”重在言说先师对中国文化的伟绩。雍正皇帝继承康熙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深刻领悟到孔子及其思想对治国的价值,既赞颂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又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无与伦比的贡献。匾额“生民未有”,典出《孟子·公孙丑上》:“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①雍正皇帝极力尊崇孔子及其学说,并以匾额的形式强调自先民以来,没有人能够超越孔子,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功莫大焉。

二

乾隆皇帝继承父、祖遗愿,推行崇儒尊孔的治国方针,一生中曾9次来到阙里孔庙,11次至北京孔庙祭孔。乾隆在孔庙留下了大量的尊孔崇儒的诗文联对,其手笔也不让乃父。翻检典籍,《钦定国子监志》记载“高宗纯皇帝御书额一‘与天地参’。乾隆三年颁揭。御制联一,曰‘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乾隆三年颁揭。”^②这副楹联是在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亲临北京孔庙行释奠礼时题写的。《曲阜县志》载,乾隆三年春三月,“衍圣公孔广燾入庙陪祀,奏准阙里盛典,书御制序文赐之。……颁御书匾额于阙里孔子庙”^③。一般形制下,一匾额与一楹联为一套,颁赐阙里孔庙的应包括这副楹联,被悬挂于大成殿内明间后金柱上。上联语出六经之一的《周易·乾》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④夫子厚德载物,遵天道,顺四时,达至人间和谐。下联赞颂孔子继承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教化世代民众。乾隆对孔子的议论褒扬,正与其经济繁荣、礼乐兴盛的“康乾盛世”相映。乾隆帝题写的“与天地参”,语出《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⑤“参”即三,此匾寓意孔子圣德可与天地匹配,与天地并列为三,极度形容孔子之圣德。

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乾隆皇帝东巡,第一次拜祭阙里孔庙,《曲阜县志》卷三十四载:“圣驾幸阙里,诣孔子庙拈香,……步入大成门,升阶盥手,入殿中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御书门榜联额悬大成殿、诗礼堂及各门。”^⑥这次拜祭题写了两幅楹联:

其一为“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挂于孔庙大成殿内明间的前金柱上。孔子删定的儒家文献经典,开启民智。与“生民未有”一样,“出类拔萃”一语本于《孟子·公孙丑上》,颂扬孔子于文教功绩盖世,犹如河海泰山,千古永存。此联在用典上步武雍正帝,如前所述,雍正帝突出的是“生民未有”;乾隆帝一如乃父,思绪所及,在于彰显“出类拔萃”。

其二为“绍绪仰斯文识大识小,趋庭传至教学礼学诗”,悬挂于阙里孔庙诗礼堂内。诗礼堂是孔子的故居,当年孔子在此教育儿子孔鲤学诗学礼,以示后人不忘孔子庭训。《论语·季氏》言“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

①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6页。

②文庆、李宗昉等修纂《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③潘相纂修《曲阜县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④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⑤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页。

⑥潘相纂修《曲阜县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248-249页。

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①乾隆皇帝仰慕其祖康熙,也来到诗礼堂讲经,兴之所至,写下这副对联。“仰斯文”与“识大识小”、“传至教”与“学礼学诗”,两者因果逻辑紧密,内涵浸润,为世效法。匾额“则古称先”出自《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②孔子的政治道德取向比较明确,正如《礼记·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心目中的楷模就是尧舜,遵从其道德规范;他崇拜周文王、周武王,效法其制,体现了儒家的道统。诗礼堂的楹联不仅是乾隆对一个家族的咏叹,也为无数家庭树立了典范,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清室皇帝不论给北京孔庙还是阙里孔庙的御书匾额,都是屈指可数的。《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明确记载了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路过曲阜阙里,“上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③。除此之外,雍正、乾隆及后来的皇帝为阙里孔庙的御书匾联在《清史稿》中皆未提及。值得探讨的是,乾隆皇帝为孔庙还题写了一副楹联“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此联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御书颁揭给都城孔庙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下令大修北京孔庙,这次修缮规模大,增加、改换了很多匾额。《钦定国子监志》记载“乾隆三十四年春二月丁亥,大修先师庙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释奠。”^④为此,乾隆帝便撰写了这副楹联。但这副楹联在阙里孔庙中却不见悬挂。按惯例,康熙、雍正题写的匾联在孔庙中都有刻石保存,乾隆题写的其他匾联在孔庙中也存有刻石,惟有这幅楹联刻石也不见踪影。《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六也说“乾隆三年皇上御书额曰‘与天地参’,联曰: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三十四年御书联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⑤为何这副楹联没有悬挂在阙里孔庙呢?

检索《山东通志》《阙里志》《阙里文献考》《曲阜县志》等,皆未有说明。笔者推测其中缘故之一,可能是乾隆皇帝专门写给北京孔庙的,没有把这副楹联揭颁天下文庙。根据康熙的做法,“康熙二十四年二月,诏以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摹搨,颁发天下学宫。”^⑥孔尚任也记载“诏以御书‘万世师表’扁(匾)额摹搨颁天下学宫。衍圣公遂将御书刻石立之圣庙诗礼堂,又将摹搨墨刻装裱卷轴恭进睿览。”^⑦乾隆皇帝的这副楹联,大概没有皇帝的颁揭诏令,衍圣公便没有在阙里孔庙悬挂。结合清代其他皇帝给孔庙的御书匾联看,一般情况下都颁赐各地文庙,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曾为孔庙御书匾额“生民未有”,并颁赐各省文庙一律悬挂。雍正八年九月,“颁发谕旨:御书匾额对联并所增加殿庑门阶之制度、俎豆尊彝之仪式及料估工程动用钱粮,自起工至告竣之日,备悉开造,交与衍圣公孔传铎,次第备纂辑成书进呈。”^⑧雍正的“御书匾额对联”开始交与衍圣公纂辑。此后,嘉庆御书颁揭“圣集大成”匾额、道光御书颁揭“圣协时中”匾额、咸丰御书颁揭“德齐帙载”匾额、同治颁揭“圣神天纵”匾额、光绪颁揭“斯文在兹”匾额、宣统颁揭“中和位育”匾额。雍正皇帝之后,皇帝的匾额墨笔都交给衍圣公,制作匾额悬挂阙里孔庙并保存。因为北京国子监为“左庙右学”之制,包括了孔庙。由此可见,乾隆皇帝

①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5页。

②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③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页。

④文庆、李宗昉等修纂《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

⑤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9页。

⑥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63页。

⑦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⑧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撰《山东通志》卷十一之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80页。

的这幅楹联,也许是专门颁给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的,故《钦定国子监志》载“高宗纯皇帝御书额一‘与天地参’。……又御制联一,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①原因之二,阙里孔庙大成门、大成殿内,已经悬挂了雍正、乾隆帝的各两副楹联,也许考虑到乾隆三十四年的这副楹联已没有更突出、更显著的位置可以悬挂,故阙里孔庙就没有出现这副楹联。

三

清室皇帝之所以大势修葺阙里孔庙,不遗余力地推崇孔子与儒学的原因,雍正帝说得最为充分:

朕惟上帝垂祐烝民,笃生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更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曲阜庙庭,为孔子里宅。毓圣钟灵之地。神爽式凭,明禋祗肃,庙貌崇闳。由周而来,久且加盛。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彻性天。自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集成于孔子者,一一体于身心。宣为政治,圣统在上,应运而承。……(《雍正八年御制重建阙里圣庙碑》)^②

由于阙里孔庙的独特价值,从乾隆皇帝以后,凡登基继大统者,都为孔庙题写匾联,并颁赐阙里孔庙,已成为定例,也被视为必然之举。这种举动在思想观念上属于崇儒重道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此举把孔庙与皇权紧紧纽带在一起,政治因素愈加得以凸显与强化。但是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嘉庆皇帝及后来的继位者,只题匾额,再没有颁揭楹联。

嘉庆皇帝继承大统,于嘉庆四年五月“颁发太学、阙里文庙、及各直省府州县学宫,御书匾额曰:圣集大成”^③。“大成”源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④“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以击钟开始,以击磬收韵,以此比喻孔子思想体系博大完美。

道光皇帝刚继位,就为孔庙颁揭匾额“圣协时中”。按《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五的说法:“(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己巳)遣官祭历代帝王庙。……颁发太学、阙里文庙、及各省府、州、县、学宫、御书扁额曰圣协时中。”^⑤“圣协时中”典出两端,一为《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⑥一为《中庸》引孔子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⑦君子居中变变,在治理国家与个人修养方面都至关重要;把握得好,才能万邦协和,黎民安定。

关于咸丰御书的“德齐畴载”匾额,《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记载:“(道光三十年,二月,乙亥)颁给京师太学、山东阙里、暨各直省府州县学宫,御书匾额曰:德齐畴载。”^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吴国季札于鲁国观乐舞后,赞美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畴也,如

①文庆、李宗昉等修纂《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②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861页。

③《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四十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20页。

⑤《清实录·宣宗显皇帝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⑦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19页。

⑧《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中华书局影印本。

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①“德齐帙载”匾额以之颂扬孔子品德如天一般覆盖万物,像地一般无不承载,其学识品格乃天地赋予,超越神灵。

时序推至同治皇帝,他颁揭的匾额为“圣神天纵”,并对颁赐的过程下诏做了详细交代。《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云:

(咸丰十一年,十月,辛巳)又谕:列圣御极之初,均恭书匾额,悬挂文庙。兹朕寅绍丕基,敬循旧典,命南书房翰林恭书“圣神天纵”扁额,交造办处成造一分,敬悬京师太学文庙。其墨笔著俟衍圣公孔繁灏到京时,由军机处交领,敬谨赍回,制造匾额,于阙里文庙恭悬。墨笔无庸撤回,即于阙里收藏。所有各直省府州县学,著武英殿摹勒颁发,一体悬挂。^②

由此可知,“列圣御极之初,均恭书匾额,悬挂文庙”,同治皇帝登基不久即“循旧典”,“命南书房翰林恭书‘圣神天纵’匾额”。同治帝6岁继承皇位,恐难题写匾额,此项任务只好由南书房翰林去完成了。并要求当时的衍圣公孔繁灏来京时带回,悬挂于阙里孔庙;而且所赐墨笔可由阙里保管、收藏,无需返还朝廷。《论语·子罕》云:“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③《孟子·尽心下》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④同治皇帝的匾额“圣神天纵”借子贡与孟子之言赞颂孔子,神圣超凡。

光绪皇帝登基时才4岁,不可能御书匾额,“斯文在兹”四个大字同样有“南书房翰林”代题。稽之《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光绪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御极之初,敬循旧典,恭书‘斯文在兹’匾额,敬悬京师太学文庙、阙里文庙及各直省府州县学。”^⑤“斯文在兹”典出《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⑥孔子继承周礼,开创儒家学派,滋润后世文化。

末代皇帝宣统颁揭的匾额为“中和位育”。与前两位皇帝一样,年幼的宣统帝把书写匾额的任务交给了南书房翰林。“中和位育”来源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⑦持正、取中,不偏不倚,既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又是儒家企望达到的理想界域。

从嘉庆皇帝始,诸帝颁揭的匾联无以复加地推尊孔子,皆立足于“四书”“五经”选取典故。在清代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经典的正统性;反过来,又彰显了封建统治的神圣不可动摇。这些庸常的匾联,似乎不太引人注目,却也凝结着统治者的一片苦心。

四

楹联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也是比较流行的文学和书法相融合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发端于我国古诗的对偶句,魏晋时期萌芽,宋元两代在民间广为流行,至明清则洋洋大观,争奇斗艳,以致有的学者把它视为清代文学的代表形式。南怀瑾就说“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

①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67页。

②《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0页。

④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78页。

⑤《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0页。

⑦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页。

说,到了清代,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①对联已将母语发挥到极致,故在清代达到鼎盛之势。清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曾亲自撰写对联,客观上促进了楹联的发展与推广;波及所向,使清代楹联大家层出不穷,如纪昀、郑夔、袁枚、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梁启超等。

天下众多庙宇佛寺宫观,都有众多的楹联匾额,或称道灵异,或乞求保佑,或摹写人情事态,或抒怀明志,诸如此类,缤纷夺目。但唯独孔庙为少,而阙里乃至天下孔庙除皇帝的匾额楹联外,文人的匾联难觅踪影,这倒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清代嘉庆年间的封疆大吏、著名楹联专家梁章钜说“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至本朝而始盛。文昌殿、关帝庙两处,撰者尤多,几于雅、郑混杂。惟文庙则未知闻。良由著笔甚难,故无人不知藏拙。忆在京师,曾游国学,得恭阅圣制大成殿联,云‘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惟圣人能言圣人,后有作者弗可及矣。”^②对于孔庙,文人虽可仰观,即便才高八斗,也不敢在此附庸呈才。因为孔庙是至高皇权的一个侧影显现,非文人驰骋翰墨之地。可见,书写匾额颁赐全国文庙不仅成了皇帝的特权,也成了皇权话语的外在显露。

孔庙的御制匾联也体现了清室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成为文物、艺术的文化综合体。这些楹联既折射出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又展示了楹联的具象性和生命力。

首先,孔庙的匾联是传承儒家文化的鲜活文物。楹联匾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往往以构思精妙、简练雅洁、意蕴深邃、韵律严谨的面目呈现,是儒家文化的特殊载体之一。相较于孔子而言,孔庙的匾联一方面彰显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伟功绩,另一方面包含着后世对其敬仰与评价;一方面闪耀着其道德人格的光辉,另一方面熏染着后人的精神品格。这些匾联成为儒家文化的点睛之笔,是孔庙的活灵魂。如果孔庙缺失了这些匾联,其物态的文化显在形式必将黯然失色,失之文化的多姿与灵气,弱化了孔庙的庄严与肃穆。

其次,孔庙的匾联作为点缀,展现了文物与书法的审美统一。针对文物与书法的有机结合,晚清学者林庆全在《楹联述录》中说“联则颜于柱,疥于壁,署于门枋左右之分,人无老少贵贱皆见之,识字者读之、记之、哦之。述焉而若有余芳;问焉而若有余味。”^③正是由于楹联匾额的醒目与雅俗共赏,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孔庙交相辉映,形神统一。

阙里孔庙与孔府是连在一体的。明弘治十二年,阙里孔庙发生火灾,几乎被全部烧毁。朝廷决定重建,历时五年竣工,规模壮丽,焕然一新。弘治十七年正月,“新庙建,规制逾旧,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御制碑文勒石。”^④李东阳缅怀先师,情动于衷,为孔府撰联云“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或许触动并启发了清室皇帝不断地撰写匾联,除顺治帝外,孔庙也成了入关后历代帝王的逞才之所。

再次,孔庙的匾联体现了中国诗教传统与诗性文化的民族特色。楹联的本质是诗性的,当然就具备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认知与陶冶作用。清室诸帝把儒学作为立国之本,崇奉孔子,以仁义敦伦教化,醇厚民风。故孔尚任在《阙里志》卷十九《风俗志》中不无骄傲地说“崇礼教,重信义,鲁之遗俗也。韩宣子谓‘周礼尽在鲁’,汉高祖谓‘守礼仪之国’,《图经》云‘家家颜闵,人人

①南怀瑾《论语别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②梁章钜等撰《楹联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页。

③林庆全《楹联述录》,龚联寿主编《联话丛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5页。

④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四《儒林传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99页。

由求。’读先王之书,文质彬彬过人,弦咏洋洋乎盈耳,斗戾争讼之事从不闻于里闾,真所谓孔氏家儿不识字也。”“江北风气刚悍,出语质直,惟阙里沐圣贤之化,得中和之道,述古称先,温霭宜人,而且字合文义,音得正声,南北语言不侔,咸折衷于宗邦焉。”^①阙里孔庙的这些肃穆鲜活的匾联,诗教的功能一以贯之,也表现了我们民族诗性文化的特色,正如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中所说“对联(对子、楹联、楹贴)是我国具有民族特征的汉语文学样式之一。”^②

阙里孔庙的御制楹联匾额内涵凝重、肃穆,意境雄浑,气势恢宏,既透射着苍茫的文化古意,也承载着儒家文化的过去与未来。恰如有学者就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论述的那样“传统与现在、未来一脉相承,历史上已经消亡而未曾流传下来的东西只能进入到历史学家的视野,唯有传承至今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历史文化才被称为传统而被赋予传统应有的价值。……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文化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当代中国正满怀信心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其中既包括文化小康、文化现代化的内容,更需要强大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力量支撑和精神保障。”^③从这个意义上讲,阙里孔庙的御制楹联匾额无疑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精神标识。我们应当高度珍视这一精神标识,通过历史的考证,细致的推敲,挖掘其中的精华成分和积极因素,使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养料。

Textual Research into Imperial Couplets and Inscribed Boards in Queli Confucian Temple

Wang Zhenxing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Jining University, Jining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55)

Abstract: The rulers in Qing dynasty wrote and bestowed quite a number of couples and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s for Queli Confucius Temple, most of them made by Emperor Qianlong's order, which were mentioned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concretely recorded in Shandong local chronicles.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time and the hanging places of part of the couplets and boards, some differences are found between Queli Confucian Temple and Beijing Confucius Temple. Writing and bestowing couplets and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s for Confucian temples in the whole country became emperor's privileges and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authority. It embodies Qing Dynasty's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These couplets and boards are not only artistic decorations for Queli Confucian Temple, but als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ic culture of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Queli Confucius Temple; made by the emperor order; couplets and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s

责任编辑: 孙昕光

①徐振贵、孔祥林编著《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495页。

②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③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审思》,《光明日报》2017年1月9日。